



巨匠丛书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

城市与狗

时代文艺出版社





● 巨匠丛书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

主编/赵德明

城市与狗

赵德明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版权登字 07—1996—82 号

“巨匠丛书”第三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之一
城市与狗
CHENG SHI YU GOU

中文版权所有©—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版权由西班牙卡门·巴塞斯版权公司通过译者授予

城市与狗

LA CIUDAD Y LOS PERROS

作 者：〔秘鲁—西班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译 者：赵德明

责任编辑：安春海

版式设计：安 然

封面设计：章桂征

责任校对：王文季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310 千

印张：13.375

印数：5 000 册

版次：1996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5387-1033-7/I·990

定价：21.00 元

全集总序

1996年5月13日，西班牙——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通过他的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尔塞斯女士致电本全集主编：鉴于巴尔加斯·略萨先生实在繁忙，原答应的《致中国读者》没有时间写出，特致歉意。1994年和1995年，笔者两次见到这位作家；一次是在北京，一次是在西班牙的穆尔西亚，两次都答应写一篇《致中国读者》，但都没有写来。究其原因，恐怕真如电文所说：“实在没有时间……”？从1995年巴尔加斯·略萨出现在各种开幕式、发奖式、座谈会、演讲会……的频率来看，用“繁忙”二字形容当不为过。但转念一想，连篇《致中国读者》的文章都没有时间来写，这将来还能出大作吗？就算两年内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卡门女士的估计），也总不能靠吃老本混日子吧？果真如此，只能说明这位大作家的辉煌已成历史而已，那么现在给他出版《全集》也就算不得超前行动了。综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从1959年至1995年36年的创作历程，读者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创作高峰期是在60、70和80年代中叶，有作品为证：

（一）、短篇小说集《首领们》写于1959年，获得西班牙

莱昂波尔多·阿拉斯文学奖。

(二)、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写于1960年，1962年获得西班牙简明图书奖；次年获西班牙文学评论奖；美国福明托文学二等奖。

(三)、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1967年问世；先后获得秘鲁全国小说奖、西班牙文学评论奖和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

(四)、第三部长篇小说《酒吧长谈》1969年出版，迅速被翻译成17国文字。

(五)、1971年完成三部文学评论著作：《加西亚·马尔克斯：一部犯有杀害耶稣罪的历史》、《一部小说秘史》和《为〈白脸蒂朗〉下战书》。

(六)、第三部长篇小说《潘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年问世；随后改编为话剧和电影，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极为轰动。

(七)、1975年完成文学评论专著《永远纵欲：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

(八)、1977年第四部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问世；不久被搬上银幕。同年当选为秘鲁语言学院院士，并被聘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

(九)、1981年剧本《塔克纳小姐》问世；先后在阿根廷、乌拉圭、西班牙、哥斯达黎加、巴西、墨西哥、美国、玻利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智利和德国上演，大获成功。

(十)、1982年第五部长篇小说《世界末日之战》问世；次年获得意大利—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第三届文学奖；该书又于1985年获得美国海明威文学奖。

(十一)、1983年创作了剧本《凯蒂与河马》；出版了文学评论集《顶风波浪》。

(十二)、1984年第六部长篇小说《狂人玛伊塔》问世。

(十三)、1986年创作第七部长篇小说《谁是杀人犯?》，并创作了剧本《琼卡姑娘》。同年，因作者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突出成就而获得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十四)、1987年第八部长篇小说《叙事人》问世；1988年该书获得瑞士颁发的自由文学奖；1989年该书又获意大利斯卡诺文学奖。

(十五)、1988年第九部长篇小说《继母颂》问世；次年，获得西班牙言情小说奖。

(十六)、1990年文学评论集《谎言中的真实》出版；同年意大利西西里政府给作者颁发了卡斯蒂戈里奥文学奖；欧洲和美国等多所大学授予他文学名誉教授。

(十七)、1991年散见在报刊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定名为《水外鱼》。

(十八)、1993年创作了剧本《阳台狂人》。同年回忆录《水中鱼》问世。

(十九)、1993年第十部长篇小说《利因马在安第斯山》；同年获得西班牙环球丛书奖；次年获得西班牙圣克莱门特主教奖。

(二十)、1994年政论散文结集出版，定名为《向自由挑战》。同年，获得西班牙国王颁发的塞万提斯文学奖，并当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次年，以色列为他颁发了耶路撒冷文学奖。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无法选择的因素，比如，父母、出生年月日、出生的地点和环境、国籍和民族，等等，它们影响甚至决定着成人后的人生选择。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于1936年3月28日出生在秘鲁的阿雷基帕市。祖父是个无线电报技师，青年时期热衷于政治，1895年3月17日带领自由派青

年发动武装起义，多次被捕又多次越狱，一生四处漂泊；祖母带着五个孩子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父亲为维持家庭生活13岁便辍学去鞋店学徒，以后学会了无线电技术，在邮局当上了报务员，后来虽然当上了飞行无线电技师，却对达官贵人有着一种仇恨。而巴尔加斯·略萨的母亲偏偏属于这样一个贵族家庭，所以“父亲一旦发起脾气来就会破口大骂略萨家族”，最后竟然导致马里奥尚在母腹中时，父亲便离家出走了。外祖父母、舅舅们、姨妈们非常疼爱这个可怜的、出生后就缺乏父爱的小外孙、小外甥，一直到10岁以前他都是大家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1946年底或1947年初，父亲突然出现并且与母亲和好如初了，但是这给小小的马里奥带来的却是：“自从搬到利马以后，我就感到自己被排除在父母之外了，对于这位突然成了我父亲的先生，时间越长，我感觉与他的距离越远。父母整天关在寝室里，这让我很生气；如果我找个什么借口去敲他们的门，父亲就会骂我一通，警告我：下不为例！他说话时那冷冰冰的方式和目光锐利的眼睛，是我在利马（从一搬到那里我就非常讨厌的城市）最初那段时间里记忆最深的情景。我时时感到孤独，时时想念外祖父母、姨外婆、舅舅们和朋友们。”从此，马里奥开始过起了与父亲为敌、孤独苦闷的生活，尤其是有一天父亲把他“一个大耳光打倒在地，然后连推带搡地塞进汽车继续破口大骂”之后，他伴随着恐惧对父亲产生了仇恨。那时，他只有10岁。出路何在？他选择了读书：“在1947年漫长而不幸的头几个月里，读书是我摆脱突然陷入孤独状态的出路……，我开始凭借想象和做梦生活，习惯于借助文学书籍煽起的想象去寻找一种与眼下这种孤独和监狱般不同的生活。”不可选择的父亲逼迫他选择了文学之路。此后，这个不可选择的因素多次把他逼上“梁山”：小学时，父亲反对他写诗，认为“那是浪费时

光的荒唐行为”，他就偏偏写诗；中学时又逼他进军校，他借助写小说与那种枯燥、乏味的军校生活对抗；18岁时，他与舅妈的妹妹胡利娅恋爱，这一次，父亲不是打耳光了，而是拿着手枪逼儿子离婚；甚至到了1997年马里奥已经是著名作家了，父亲还在干涉他的创作，直到父亲去世前，二人都没有和好。

政治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人生道路上又一个不可选择的因素：参加过秘鲁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最后退出；参加过左翼学生运动，最后退出；亲自组织了自由运动组织，最后解散；1989年参加秘鲁总统大选，失败后出走。30多年来，他对政治一直感兴趣，很想从政，但是，秘鲁人民并不选择他。1995年10月，笔者在西班牙召开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作品讨论会上提出一个看法：“如果巴尔加斯·略萨在1990年第二轮的秘鲁大选中获胜，广大读者会失去一位优秀的作家；可是秘鲁历史上未必会增加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理由很简单：耽于文学想象中的马里奥距离秘鲁严酷的现实太远。他从1958年迁居欧洲生活以后，虽然不时地回国看看，但毕竟是走马观花；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会在政治风云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一套。他的文学代理人卡门女士说，他脑袋里装满了文学故事，哪里容得下政治垃圾呢！“如果说第一轮选举是肮脏的话，第二轮就是臭不可闻的了。”因此失败后他有一种脱离了苦海的轻松感也就不奇怪了。

西方文坛选择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不仅是因为他选择了文学创作之路，更主要的是他具有文学创作的才能。1993年在西班牙出版的《西班牙及西班牙美洲文学辞典》是这样说的：“50年代，秘鲁有一批优秀的作家，此时巴尔加斯·略萨还是学生，但是他与这些作家过从甚密；这些老作家很看好他的文学才能，但是，巴尔加斯·略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上

了与前辈不同的文学道路。主要区别在于：他摆脱了先入为主的教条理念，努力追求独特和新颖。”独辟蹊径，这是马里奥在文学上的选择，具体表现在对小说的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他立志写出可以“包罗万象”的作品来，为此，他在《城市与狗》中运用了电影蒙太奇手法、意识流手法；在《绿房子》中创造了“连通器法”、“中国套盒术法”；在《酒吧长谈》中创造了“对话波”的结构方法；在《潘上尉与劳军女郎》中将“对话波”中又糅进书信、档案、简报、录音记录……构成“记录体”小说；在《世界末日之战》中，在“白描”的基础上又糅进了大量的“潜意识”描写；在《狂人玛伊塔》中，则采用了新闻采访记事的手法；总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炒“冷饭”，而是一味求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伟大的小说不是去抄表现实，而是把现实解体，再适当地加以组合或夸张。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把现实表现得更富于多面性。”他的创作实践充分地反映了他的这一主张。当今西方文坛对他的评价是公允的，诸多文学大奖和荣誉头衔他是当之无愧的。

1995年笔者从卡门·巴尔塞斯文学版权代理公司获悉：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有个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爱好者俱乐部正在筹备出版《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目的在于“全方位认识马里奥的价值”。我们翻译和出版这套《全集》当然也有这个目的；但是，在“认识价值”之外，还有“比较价值”和“借鉴价值”。仅“比较价值”一项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综观巴尔加斯·略萨三十多年来的文学创作成果，可以发现许多“矛盾”之处，从思想内容方面说，《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这三部60年代的力作都以强烈的批判精神抨击独裁政治、官僚腐败和种种社会弊端。进入70年代的

创作，这种批判精神有所减弱，调侃、嘲讽的意味增多，比如，《潘上尉与劳军女郎》、《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作家固然对军队中的丑恶现象、意识形态造成的疯狂行为和社会上落后、愚昧、保守思想的毒害深恶痛绝，但远不是像60年代那样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了。可是，进入80年代以后，政治暴力、武装斗争、农民起义、宗教狂热等重大社会问题再度出现在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中，比如，《世界末日之战》（1981）、《狂人玛伊塔》（1984）、《谁是杀人犯》（1986）中又一次表现出作者对拉丁美洲社会黑暗的强烈不满和批判精神。可是在1988年发表的《继母颂》中，这种精神荡然无存，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情爱小说。而1993年出版的《利图马在安第斯山》则又一次触及秘鲁农村中的暴力问题，那时带有政治色彩的恐怖活动是秘鲁社会的肿瘤之一，作者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揭示出贫困、愚昧、社会不公正、政治腐败是产生暴力的原因，这表明巴尔加斯·略萨虽然长期生活在欧洲，却一直情系祖国，一直在关注秘鲁乃至拉丁美洲的社会变化，这一点可以从他为欧洲报刊撰写的大量文章中得到证明。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多年来巴尔加斯·略萨的政治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左翼”青年变成了“右翼”组织的领袖。有趣的是这一变化并非他一人独具，而是在亚洲、前苏联等地区和国家都出现过这样的人物，君不见50年代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不都是以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目标而换取了“总统”的宝座吗？个中原因虽然不在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近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大潮冲淡了冷战的热度，并最终导致了冷战的结束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则是不争的事实了。巴尔加斯·略萨在这个大潮中政治观点时有变化当在情理之中，何况他一向是个对国家乃至世界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作家。难能可贵的是，面对纷纭复杂的世界变

化，他一直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选择的精神。至于选择的正确或错误则只有留待后人评说了。

第二、在文学观念方面，比较一下这30年来的变化，可以发现巴尔加斯·略萨接受过各种各样的文学主张和一些文学大家的影响，比如，福楼拜、福克纳、萨特等，但他从来不独尊一家。18岁时，许多秘鲁作家告诉他，不要过分追求“形式”，关键在于写“熟悉的生活”，有些人甚至说：“秘鲁文学最大的成就在于反映‘乡土’生活。”这个观点用在某个具体时期或许是适宜的，但是定于一尊、作为永恒的尺度就会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巴尔加斯·略萨对“乡土文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从事和提倡这个‘乡土文学’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文学刚好与文学的初衷相反，是世界上最为常规和听话的东西，是一系列用机械方式重复制造的老俗套，里面的民间语言既过分修饰又过分讽刺，加上故事结构的松散，便完全扭曲了他们试图伸张正义所运用的历史——批评的证据。作为文学作品，它们的可读性很差；作为社会文献来看，它们又是骗人的；因为实际上，它们是用粉饰、空洞和奉承的话语对复杂现实的歪曲。”他进一步剖析说：“‘乡土’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文学领域不发达和乡土观念的标志，就是那种天真汉对作家才能的肤浅和低级的解释；那种天真汉认为只要发现好‘题材’就能写出好小说，因为他们还不懂得：一部成功的小说是思想勇于探索的结果，是一种艰苦的语言劳动，是发明叙事程序和时间、安排情节、提供信息的默默劳动，一部虚构小说的真实与虚假、动人与可笑、严肃与愚蠢，完全取决于上述劳动。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能不能成为作家，但那时我就明白：我绝不当‘乡土’文学作家！”公正地说，“乡土”文学对于秘鲁文学的发展是有过贡献的，但是，任何“主义”和“流派”的文学都不是

永恒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从“主义”中产生的，而是作家对社会生活进行观察、思考、提炼、艺术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果。以巴尔加斯·略萨创作《酒吧长谈》为例，他在读大学时曾经与独裁政权的保安头子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脑海里对这个人物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天，他妻子心爱的小狗被“打狗队”抓了去；他闻讯赶到狗棚把爱犬抢了出来，一路小跑之后又遇上了“打狗队”的人们，小狗吓得瑟瑟发抖，他连忙抱着狗躲进了一家酒吧。落座之后，巴尔加斯·略萨联想到老百姓面对独裁政权的恐惧心理，萌发了创作《酒吧长谈》的动机。此事发生在1955年，而《酒吧长谈》的问世是在1969年。他说这部长达669页的小说是让他最费时费力的一部作品。其主要精力和时间是用在寻找切入的视角、时间、空间和结构的安排上了。他的目的在于追求描写的真实性和作品的感染性。真实与动人是在文学道路上的毕生追求。舍此之外，他不希望让文学承担更多的承诺，虽然他很重视选择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创作的基本素材。因为他深切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文学主张都有局限性，而这一认识是建立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的。他曾经阅读过《堂吉珂德》，但是没有读完就放下了，因为看不懂！那是在中学时期的事。后来，读了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写的《堂吉珂德之路》方才引起他重读这部大作的兴趣，读罢拍案叫绝，从此产生了阅读骑士小说的兴趣，并且获益匪浅。对于博尔赫斯的作品，他“起初，我还带有某种心理暗示——那种纯粹或者过分精神上的东西，似乎是从一种非常直接的生命体验中分离出来的东西，让我难以读下去——但是，我又总是怀着惊讶和好奇的心理重读。直到后来，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距离变成了钦佩”。他对许多文学大师和优秀作品都持这种态度：不盲目迷信，不人云亦云，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然后自

已得出结论。比如，关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小说是对世界现状的亵渎；是对现实不妥协的见证与源泉；小说无可辩驳地证明：真正的现实和我们经历过的生活，与我们的现状而不是我们希望的现状相比，仅仅是一小部分，因此我们要创造新现实、新生活、虚构的生活。这种生活由于高于现实之上，特别是虚构得非常出色时，比如像《堂吉珂德》那样，就不是社会繁荣、昌盛的征兆了，而恰恰是它的反面。一部作品的出现总是表明这是一次充满勇气的造反行动，它构成一个想象世界的外观，在保留现实世界面孔的同时，实际上是排斥现实和质问现实的。大概这可以用来解释塞万提斯的毅力，他似乎是以顽强的意志在忍受着恶劣的环境：他以象征性的弑神之罪去报复环境，他从希望中汲取力量，编造出一个新的现实，用其光芒照亮了虐待他的现实并反抗那个现实。”这样一种关于“文学真实性”的看法不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提得出来吗？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提法更符合文学的“真实”！

第三、在文学技巧方面，比较一下巴尔加斯·略萨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可以看出他在创新的道路上没有徘徊过。如前所述，他在作品的结构上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新的探索，这是因为他要建构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新天地，那里的一切都是崭新的，但是建设新天地的材料——语言又是人们用过多时因而是十分熟悉的，面对这个矛盾，作家就不得不改造语言，就是说，语言技巧的更新是建设新天地的需要。设计出新天地的蓝图之后，建筑材料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的了。这就是为什么巴尔加斯·略萨在创作每一部作品时都要花样翻新的原因。设想一下：如果他设计和建造的每一座大楼都是“火柴盒”，他还能称得上是建筑大师吗？“文无定法”既是建造文学新天地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代又一代读者对辩论学的要求：人类的生命特征之一在于

“心之官则思”，其中善于幻想是一大特征，而幻想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幻想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并具有可重复性，从而也冲破了现实生活的有限性和不可重复性。而这正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思想自由地翱翔！“文无定法”是思想自由冲破现实生活局限性的必然要求。对此，巴尔加斯·略萨比同代作家觉悟得早，行动得快，因而成绩斐然。

1996年4月2日，笔者在同巴尔加斯·略萨的版权代理人卡门·巴尔塞斯女士谈话时，这位女士不同意笔者关于这位作家创作高峰期已过的说法，坚持认为巴尔加斯·略萨还会有大作问世，理由是：他刚刚60岁，身体健康，可谓年富力强；创作经验丰富且历尽人生沧桑；尤其重要的是：创造活力旺盛，创作技巧娴熟。结论：创作前景看好！

笔者的回答是：但愿上帝与他同在，阿门！

赵德明

1996年6月8日于北大燕东园

凯恩说：“有人扮演英雄，因为他是怯懦的。有人扮演圣徒，因为他是凶恶的。有人扮演杀人犯，因为他有强烈的害人欲望。有人之所以欺骗，因为生来便是说谎的。”

——让-保尔·萨特

第一部

